

新旧世界的夹缝

——林纾在 1919

张治

诚然,白话文学需要更“进化”的形态,外国文学需要更高明的译才;可是处在新旧过渡的时代,难道求新就需要以“损旧”为必然代价吗,一蹴而就的新真会很新吗?林纾此前从未觉得自己是守旧派,但在后辈更为激进态度的对照下,他感觉自己好像难免也被迫坠入腐朽的老顽固队伍中了。

1919年,岁次己未。这一年对于68岁的林纾来说颇不平静。去年春天,北大那批青年教师办的刊物上,一个叫“王敬轩”的读者来信推崇“林先生”是“译笔健雅”的“当代文豪”,居然被杂志编者斥责一顿,说“林先生”翻译的都是“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”的“闲书”。毫不奇怪,两年前他在天津《大公报》发表《论古文之不宜废》后,就被“新青年”盯上了,钱玄同、刘半农、陈独秀都陆续对之进行讥刺嘲讽。更早的恩怨,也许是钱基博所分析的那样,为桐城人物被“章门之徒”逐出北大而不平;还有一笔账,即陈独秀《文学革命论》里排出的“十八妖魔”,包含了桐城家法里的列代祖师。

今年2、3月里,林纾给学生张厚载替他在《新申报》张罗的专栏上发表文言小说《荆生》《妖梦》,又刊出两封公开信,《致蔡鹤卿书》(1919年3月18日《公言报》),《再答蔡鹤卿书》(1919年3月25日《大公报》,次日又在《新申报》刊出)。小说引起的波动比公开信更大,《妖梦》咒骂“鬼中三杰”,影射的是蔡元培、陈独秀和胡适,从长相上进行挖苦和羞辱,实在显得很低级;更为人不齿的是《荆生》里动用武力来解决争端,被敏感的新文化人物认定这似乎是要召唤军阀来镇压他们。于是,林纾被确认为无能的反对者,大家忘记他在公开信里说了什么话还值得思考了。各家报刊媒体纷纷转载的就是这两篇小说,有时还加上了特别的按语,比如“想用强权压倒公理”云云,今天的话说来,就是故意要“晒”林纾。而到了4月,陈衍主编的《文艺丛报》第一期上,还刊出林琴南一篇《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》的文章,学理思想如何,也就都不那么受人重视了。《新申报》的主笔张厚载被北京大学开除了,林纾为他送行,赠《序》里说“张生”一副无所谓的样子,“若无所戚戚于其中者”。

平心而论,林纾本来并不反对白话文学,他在世纪之初就为杭州《白话日报》撰写《白

话道情》了;1919年3、4月他还在《公言报》连续发表他的《劝世白话新乐府》和《劝孝白话道情》。至于提倡新文学,引入外国文学,他翻译的《茶花女遗事》《迦茵小传》《撒克逊劫后英雄略》等等,这些后生谁没读过?诚然,白话文学需要更“进化”的形态,外国文学需要更高明的译才;可是处在新旧过渡的时代,难道求新就需要以“损旧”为必然代价吗,一蹴而就的新真会很新吗?《公言报》上发表的《腐解》,提到自己的“七十之年,去死已近”,林纾此前从未觉得自己是守旧派,但在后辈更为激进态度的对照下,他感觉自己好像难免也被迫坠入腐朽的老顽固队伍中了。他生气地在《新申报》那个文言笔记小说的专栏里写道:

吾年七十,而此辈不过三十,年岁悬殊。我即老悖颠狂,亦不至偏狭挟量至此。……我老廉颇顽皮憨力,尚能挽五石之弓,不汝惧也。来!来!来!由此看来,文言小说里的那种近乎谩骂的方式,在老迈却易怒的林纾这里,顶多算是不注意修养和分寸的一种失态表现;老年人认死理,觉得后辈晚生不懂事,发脾气下来,大概就是这样的吧——后来“新青年”们变老了,也未尝不曾有类似的表现。这年林纾和唐文治议论废经、与族侄林悖论师道的文章,实则也都是在宣泄他对新文化运动激进姿态的不满。《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》里说过“吾辈已老,不能为正其非”这样无可奈何的话;然而,“新青年”们没有放过他,从此之后毁谤之言不绝于耳。甚至连这一年他第五个女儿出生,后来都被鲁迅捉弄了一番,称“曾在一个药房的仿单上见过他的玉照,但那是代表了他的‘如夫人’函谢丸药的功效”(《论照相之类》)云云;事实上林纾甚至根本没有小老婆。

在已经经营了二十年的文学翻译“作坊”里,至少从产量上看,这种衰老退化的感受还并不明显。1919年,林纾和他的合作者们又译出了十来



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纾译《茶花女遗事》

1922年的林纾,时年71岁,刊《人间世》第14期(1934.10.20)



种外国小说,五花八门的,很出风头。这一年,北京上海的市民读者打开《小说月报》第十卷,会发现每一期开篇依然都是他们熟悉的林琴南:起初有从西方歌剧情节编译的《泰西古剧》,之后又加进来一部西方中世纪故事集《妄言妄听》。还出现过一部中短篇的哈葛德《豪士迷猎》,讲述的还是英国人在黑非洲的冒险经历。这种风光的气势已经维持不了太久了,下一年的《小说月报》目录里会出现一个新栏目“小说新潮”,主持人是沈雁冰;此人很快会切断手里这个杂志与“林纾公司”的固定关系,并即将不再刊发“林译小说”。沈雁冰对林纾的反感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后所被塑造的形象,他对“林译小说”本身也许并不太了解。很多年后,已经成为著名小说家茅盾的沈雁冰撰写了一部《汉译西洋文学名著》,选目中排在荷马史诗之后的中古文学作品《屋卡珊与尼各莱特》,就是《妄言妄听》里的《阿卡西》。

然而“林译小说”也的确是鱼龙混杂。这一年的《小说月报》,除了上述三种,就还有一部侦探小说集《焦头烂额》,原作者“美国尼克拉司”,其实就是“Nicholas Carter”,是一个共用的化名,涉及十多位小说家(并非张俊才先生《林纾评传》

附录里所说的五作家共同之笔名)。这些人一起创造出位著名的侦探人物尼克·卡特,多达一千多部小说。清末民初很多书局都推出了大套中译本,以小说林社的十六册《聂格卡脱侦探案》最为显赫。林纾译了三个故事,连续在1919年的《小说月报》上出现了十期。侦探小说会是未来中国文学的主流或出路吗?至少从新文学家立场看,他们是视为洪水猛兽的。

“新文化”的人物们不光要在《小说月报》上忍受林琴南,打开其他几个刊物也都能一直看到他的名字。《东方杂志》本年出到第十六卷,最后几个月有一部《戎马书生》开了头,而前九期的文学版面都是林纾和陈家麟合译的《略史》,那原是英国作家写的一部涉及潜水艇事件的间谍小说。不知为何误作法国作家;而更糟糕的是,里面有一个病句用法,被“新青年”们揪住不放,闹得沸沸扬扬。这是指《东方杂志》本年第七号《略史》第二十一章里的“有出人意料之外者”。陈独秀、周作人随即先后在《每周评论》都有意提到林琴南先生的独特发明,钱玄同、刘半农、鲁迅、李大钊此后均明里暗里有所讥刺。即便是九十年后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想要为之平反辩护,也被评定为“翻案文字究未能

成立”(常方舟《迟到却不应缺席的正名》)。何况是当时,这番连珠炮一样的攻击足够让身为文章宗师的林纾好受的了。

此外,《学生杂志》在连载他和陈家麟翻译的《鸫巢记》,原作即瑞士作家Johann David Wyss所撰《瑞士家庭鲁滨孙》(Der schweizerische Robinson),当系由英译本转译而成。这时的“翻译公司”,很不在乎翻译的书会不会和别人“撞车”。实际上,商务印书馆的“说部丛书”里早就有一部《小仙源》,初刊于《绣像小说》时,曾署“戈特尔夫芬女士著”,由此考知应该是根据Mary Godolphin英文改写本译出的。小说写的是一家瑞士人(夫妇,四子,两犬,其他动物,一个收养的英国女儿)在东南亚去往澳洲途中遇海难,登陆荒岛长达十年的历险故事。也许在林纾心中,既然他译过完整的《鲁滨孙漂流记》和《续记》(翻检整个汉译史,这两部都译过的人也只还有汪原放),那么这部仿效之作他也应该有资格来译译的。正如作为哈葛德(Henry Rider Haggard, 1856—1925)的翻译专业户,不久之后他还会翻译一部《世界的欲望》(The World's Desire),题作《金梭神

(下转8版) ➤